

对历史与理论的三种看法

Three Visions of History and Theory

查尔斯·蒂利

(汪卫华 译)

译者说明：本文是查尔斯·蒂利对 2005 年和 2006 年出版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重塑现代性》和《牛津处境政治分析手册》三本书的书评，首刊于《历史与理论》2007 年第 46 卷第 2 期（第 299–307 页），后收入蒂利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文集《解释社会过程》（Charles Tilly, *Explaining Social Processes*, Boulder and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08, Chapter 15, pp. 190–199.）。译文刊于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第 155 号。

就历史与社会理论的关系，我们如何才能培养出一种切实可行的看法？本文比较最近出版的三本书¹，来澄清这个问题上的诸多得失与各种可能。彼得·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审视社会与文化理论，主要依据它们对历史实践的贡献来梳理了各种理论资源。茱莉亚·亚当斯、伊丽莎白·克莱门斯、安·舒拉·奥洛夫及其他贡献者们聚焦于历史社会学，但在寻找理论的各种有效应用上，他们涉猎甚广。罗伯特·古丁、查尔斯·蒂利及合作者们试图超越现代论和后现代论的冲突，认真对待政治过程的各种处境如何影响了这些过程以及学者们对这些过程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历史与社会理论之间关系的这三种看法分别称为实践感、文化现象学以及系统建构论。

虽然伯克给他的书贴上了“第二版”的标签，但它实际上可视为 1980 年他那本关于社会学和历史学专论的第三个版本。该书第一版出现在由 T. B. 巴特摩

¹ 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eds.,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obert E. Goodin and Charles Till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xtual Political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尔和 M. J. 马尔凯主编的公开大学“社会学争议”丛书中。²《社会学与历史学》呼吁应结束历史学家为一方、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为另一方的“聋子的对话”。而本书则主要通过列举与历史分析相关的一系列社会学和人类学话题——比较方法、各种模型、结构与功能、社会角色等等——来实现这一目的。但它也提供了对赫伯特·斯宾塞、卡尔·马克思、费尔南·布罗代尔、威廉·H. 麦克尼尔、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以及纳坦·瓦克泰尔的简要解说，探询四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麦克尼尔、勒华拉杜里、瓦克泰尔）是否指出了那些“比以前的各种模型更多地考虑到多样性和长期趋势，并比之前更清楚地具体说明了各种可替代的路径和各种约束”的社会变革模型。³

伯克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就像先前住客的灵魂一样，萦绕在他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二版之中。两本书都从“聋子的对话”开篇，尽管如今“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分化”变成了“历史与理论的分化”，正如“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合流”变成了“理论与历史的合流”。这本新书用整整一章来讨论模型和方法，扩充了源自社会科学、对历史分析产生影响的各种主题的名单，更慎重地处理了各种知识上的问题，增加了一章来讨论后现代性和后现代论，但仍然以斯宾塞、马克思及其替代者们为中心来讨论社会变迁。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篇幅较原著翻倍，比其前身更注重哲学、文学分析和一般性理论。像恩斯特·贡布里希、米哈伊尔·巴赫金、托马斯·库恩和米歇尔·福柯这些大人物（除了福柯，其他人在头一本书中都没有出现，且福柯在其中是作为一位有趣的精神病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位颠覆性的社会哲学家出现的），如今作为理论家被加以着重讨论。然而，这两本书都专注于历史学家和社会分析家在各自的工作中可以从彼此身上汲取什么经验。《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散发着实践感。我们看到，伯克在社会理论大商场里，拿起有趣的物件，好奇地审视它们，看看它们能否在自己的工作坊里派上用场。

伯克的实践感划定了理论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能够和应该发挥的作用。伯克认为，构建一部综合的世界历史是没有希望的，也不可能通过历史证据来检验各种具有时代性的理论，甚至不可能通过学科性的比较来识别各种地点上和时

² Peter Burke, *Sociology and Histo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0).

³ Burke, *Sociology and History*, 105.

间上的系统性变化与差异。相反，他假定历史学家试图弄明白特定的时间、地点、现象和转变，理论家们则可以就此提供有效的描述工具和解释工具。例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是人们认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朝臣和肖像画家如何表现自己和彼此的洞察力源泉，而不是（比方说）启发人们思考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所谓“文明化过程”实际上是如何对个人言行举止产生影响的。与此类似，伯克谈论索尔斯坦·凡布伦（Thorstein Veblen）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并非要展开一场关于不平等体系之间变化与差异的讨论，而是强调历史上精英们是多么频繁地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宣传自己的地位。我们见识了一位敏锐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学家通过扫描社会理论家们的工作，搜寻更有效地完成其本职工作（进而也是其他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的各种手段。

在他的书的结尾，伯克通过下述观察巩固了这种印象：

如果从一开始还不明显的话，现在就很清楚了，经验论者和理论家们不是两个紧密结合的群体，而是处于光谱两端。概念借用往往发生在理论方面邻近的学科之间。因此，历史学家从人类学家那儿借，人类学家从语言学家那儿借，语言学家从数学家那儿借。

作为报答，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者一样，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经验和制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诸多理论不可避免地会简化它们。这种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理论家们搞简化是错的。正如我在前文中试图指出的那样……简化是他们的职责，是他们对各种研究路径和不同学科之间分工的贡献。然而，这种多样性表明，理论永远不能简单地被“应用”于过去。⁴

于是我们开始瞥见了一种生动的看法：历史是人类财富的宝库，理论是一套陈列这些财富的工具和隔间。

半不得已半选择，伯克对于历史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看法排除了其他历史学家们认为是相干的、甚至必不可少的大量理论。不可避免的，伯克的纲领排除了

⁴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188.

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严肃考量。即使是关于后现代性和后现代论的讨论，也集中在社会建构、去中心化、反欧洲中心主义、全球化等方面，而不是历史存在性和知识之类的难题。伯克正确地指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相关的若干发展”，如果定义准确的话，在主流历史学研究中几乎没有一丁点进展。⁵ 因其对历史技艺的实践感，伯克赞成这一共识：对各种激进的创新——无论是哲学上的还是方法论上的——要保持冷静的怀疑态度。

社会科学、语言学、地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中诸多可用的理论资源几乎从伯克的核算中消失了。另一支几乎缺失的理论值得特别关注：形式经济理论。在经济学家中，只有 A. V. 查亚诺夫、约翰·D. 希克斯、阿尔伯特·赫希曼、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维图德·库拉（Witold Kula）、戴维·兰德斯、卡尔·波兰尼、W. W. 罗斯托、索尔斯坦·凡布伦以及阿玛蒂亚·森出现在文本中——不出所料，提到后者是因其对理性选择模型的著名批判“理性傻瓜”。他们是作为准历史学家出现的，而不是作为形式经济理论的生产者。除了顺便提及计量史学，甚至连计量经济学中的计量经济史研究也没有进入伯克对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之中。

这种忽视很可能反映了伯克自己对形式模型和定量分析感到不适；例如，在相邻的两句话里，他解读了费尔南·布罗代尔，估计 16 世纪晚期地中海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为 20 达克特金币，然后错误地推导出穷人（定义为年收入低于 20 达克特）占了总人口的 20% - 25%。⁶ 无论如何，伯克也忽略了以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经济制度分析对过去 20 年经济史研究强有力的、且大部分内容不可量化的影响。⁷ 含蓄但也可以理解地，他把自己所精通的解读式社会与文化史当作了历史 - 理论对话的参照点。

更令人惊讶的是，伯克忽略了人们原本以为他会强调的两次“转向”：历史学之中的文化转向，以及社会科学之中的历史转向。⁸ 在历史学中，战后对社会

⁵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176.

⁶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36. 伯克把布罗代尔书中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与总人口的数字弄混了；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vol. I, pp.458, 460. 考虑到非常高的收入对总收入以及人均收入的贡献不成比例，每年收入在 20 达克特或以下的参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必须至少达到 60%，但生活在这一门槛以下的所有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这一比例。

⁷ 参见 Douglass C. North,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⁸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科学的热情持续了大约 30 年，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历史学科被分成了两个不相等的部分：少数人专门研究诸如计量经济史、人口史和定量城市史等综合性的和极其社会科学式的领域；大多数人则从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转向文化人类学，作为其社会科学式灵感的主要来源。几乎与此同时，在社会科学各领域，历史比较分析重新获得了几十年间在抽象化的经验主义中失去的某些声望和能量。

也许这两次转向开始得太早了，不足以影响伯克对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的处理。但它们的缺席，让伯克得以说，自 1950 年左右以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或多或少一直在持续地修好，而非曲折反复。它们的缺席也为伯克的分析赋予了一种无关时间的品性，从而未能说透那些他提供了明智反思的议题在历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中其实一直是激烈斗争的事项。

有关强烈的斗争感，请读一读亚当斯、克莱门斯、奥洛夫和其他贡献者们的作品《重塑现代性》。这本 600 多页的书承担了两个相关的任务：解读二战以来广义历史社会学实践之中的各种变化；以及，证明我们可称之为“文化现象学”的东西是一种优于对社会过程的决定论的、外在论的解释（书中大多数作者认为后者盛行于 20 世纪后期）。事实上，伯克很好地预见了我们在亚当斯、克莱门斯和奥洛夫等人的作品中所看到的对先前研究的态度：

然而如今，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常被视为决定论的，从而被拒绝接受，大家转而强调集体创造性。过去被假定为是客观的、坚实的那些社会事实，如性别、阶级或共同体，现在被假定为是文化上“被建构的”或“被构成的”。与结构主义者相反，后结构主义者强调人的能动性，也强调变化，与其说是建构，不如说是重构，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因此之故，“本质论”在他们的词汇中是奇耻大辱之一。⁹

但是亚当斯及其同仁采取了一种不大一样的后结构主义立场，他们的研究

1994); Terence J.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Eric H. Monkkonen, ed., *Engaging the Past: The Uses of History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William H. 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Past and Present* 85 (1979), 1–24.

⁹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175.

纲领是重铸历史社会学的前提。在本体论上，他们的书提出了个体性的人类意识作为社会过程的主要场所和源泉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它强调对意识的解读（因而也就是对记录意识的文本的处理）是了解历史上各种社会过程的手段。在方法论上，它暗示了一种阐释学研究路径，但没有使用这个术语。在其结语中，伊丽莎白·克莱门斯提出了她视为该研究纲领的关键研究问题：

可用的各种实践剧目或图示如何塑造可能行动的空间？不同文化图式是如何结合起来的？现有的图式如何与内嵌于社会关系与实践体系中的新项目或可用范畴联系起来？将这些问题统一起来的，是一种被建构的历史意象，但并非一种无限可塑、尚未完工的作品；重组时刻不像例行公事那么多，但却影响深远。¹⁰

为了实现这一议程，主编们与作者们对晚近的历史比较分析研究工作进行了广泛调查。主编们的导言与结论占了全书篇幅大约五分之一，为检索性文章留下足够的空间，这些文章的作者是理查德·别尔纳茨基（Richard Biernacki）、津恩·马古贝恩（Zine Magubane）、乔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菲利普·戈尔斯基（Philip Gorski）、安·奥洛夫（Ann Orloff）、埃德加·凯泽和贾斯汀·贝尔（Edgar Kiser and Justin Baer）、迈耶·凯斯滕鲍姆（Meyer Kestnbaum）、罗杰·古尔德（Roger Gould）、纳德·索哈比（Nader Sohrabi）、布鲁斯·卡拉瑟斯（Bruce Carruthers）、瑞贝卡·埃米（Rebecca Emigh）、骆明正（Ming-Cheng Lo）、林恩·斯皮尔曼和拉塞尔·费格斯（Lyn Spillman and Russell Faeges）、玛格丽特·萨默斯（Margaret Somers）以及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都是社会学家，皆来自当代美国社会学界最具历史取向的一翼。

照主编们的说法，该书贡献者主要属于战后历史社会学的“第三波”。小规模“第一波”，包括巴林顿·摩尔和莱因哈德·本迪克斯等学者，拒绝了特别是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在内的社会学同辈学人的当下主义和现代主义。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规模大得多的“第二波”，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问题（尽

¹⁰ Adams et al., 505.

管不一定有答案)组织起来。虽然对第一波的先驱者们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但亚当斯、克莱门斯和奥洛夫却把第二波学者视为有待推翻的霸主们。他们声称,第二波学者们仍旧坚持对稳定的现代性抱有幻想。此外,他们还通过知识权力把戏来捍卫自己陈腐的观念:

历史社会学家们,像其他学者和知识分子一样,在不知不觉中依附于这种大局已定之感(即实现了的现代性),并因其丧失而无所适从。因此,当他们对老旧的总体性、对想象中的理论稳定的往昔产生怀旧情绪,或对感知到的威胁感作出反应时,他们会监控知识探索的边界以试图强行重新解决问题,或者干脆拒绝辩论或考虑新的思考方式,这是很自然的。¹¹

作为第一波和第二波被点名的成员,我读到关于所谓我们的那些误解和恶行,只得皱眉蹙额、龇牙咧嘴。不过,我这儿的任务并不是为我自己和第二波同仁们作辩护,而是考察亚当斯-克莱门斯-奥洛夫的分析所蕴涵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看法。

根据这份年表,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的“第三波”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观,转而强调文化、意识和解读。因而,“行动者及其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深刻地由文化和历史局势塑造构成的,而非某些底层经济关系体系的反映。”¹²例如,在理查德·别尔纳茨基(Richard Biernacki)看来,从第二波到第三波的转变涉及从“手段-目的推理”到社会行动者行动的“情境重构”。行动不再是通过工具手段对明确目的的追求,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人为设计”。¹³

既然,正如别尔纳茨基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斯·韦伯的大部分分析都是围绕着手段-目的图示组织起来的,那么《重塑现代性》一书的读者一定会感到惊奇。因为这本书中最被广泛讨论和引用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斯·韦伯!在这本书中,韦伯兴旺发达,马克思身后凄凉,而福柯和(更令人惊奇的)埃米尔·涂尔干仍旧是灵感源泉。

¹¹ Adams et al., 68.

¹² Adams et al., 69.

¹³ Adams et al., 76-82.

韦伯之所以吸引了这些理论家们，有两个不同的理由：一是他是典型的受历史影响的社会学家，二是他的手段 - 目的分析观将有意识的行动者置于中心舞台。福柯占据如此大的地盘，照主编们的说法是因为：

福柯的研究工作不可归类——即便算不上是标准的社会学 (*sociologue*)，但它们无疑与历史社会学眉来眼去，也是我们许多研究生理论课程上教授的内容。他的研究抓住了常态化话语和“自我的技术”在历史上的出现，并追踪了它们被嵌入并协助创建一大批规训复合体（包括监狱、诊所、忏悔室及国家机器）的各种过程。这些话语有助于创造它们所描述和规管的那些个体。这些论点已成为探查有关扭转各种历史范畴的权力痕迹的令人兴奋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的推动力。¹⁴

因此，福柯为第三波学者们提供了周遭文化与被情境化的社会行动之间的联系。

涂尔干同样为第三波的立场提供了追溯背书。照主编们的说法，在第二波中被“憎恶”的涂尔干，作为“各种认知范畴由社会决定”的守护神回来了。¹⁵ 这本书的“文化现象学”集中在有意识的人类行动者的形象上，他们积极地利用周遭文化提供给他们的材料来组织他们的世界。在这种程度上，他们仍然是可用的语言和信念 (*doxa* 借用这本书中从皮埃尔·布迪厄那里反复引用的一个术语) 的囚徒。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作者们要投入这么些精力来抨击以利益为基础的第二波马克思主义分析。源自社会结构内位置的利益，与作为社会行动基本解释的、嵌入文化的现象学相矛盾。

在关于历史分析中的宗教的那篇文章中，菲利普·戈爾斯基 (Philip Gorski) 挑衅地以《受压迫者的回归》为题，他指出早期的社会学家，像韦伯和涂尔干，赋予了宗教头等重要性。甚至第一波分析者，包括什穆埃尔·艾森施塔特和罗伯特·贝拉在内，也把宗教作为关注的焦点。但是，戈爾斯基正确地观察到，第二

¹⁴ Adams et al., 41.

¹⁵ Adams et al., 40.

波通常忽略了历史变迁中的宗教因素。¹⁶ 戈爾斯基对这种故意的忽视提出了四条解释。首先，第二波分析者们强烈反对社会学中将社会过程从理念和价值观中派生出来的观点——又是帕森斯！——并且竭尽全力回避与他们所认为的理想主义相冲突的争论。其次，在马克思主义中，他们特别借鉴了《共产党宣言》的看法，即坚持从物质关系的坚实基础上衍生出宗教等意识形态。再次，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西达·斯考切波、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其他杰出的第二波分析者们的研究作为历史社会学其他实践者设定了议程，不管他们是否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最后，作为坚定的现代论者，第二波的成员们继承了启蒙运动的观点，把宗教视为现代性之敌，是现代化正在根除的力量。在戈爾斯基的分析中，就像他的合作者们一样，韦伯的复兴和马克思的降级构成了文化现象学研究纲领的基本组成部分。

不过，请不要让我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在这本大部头的书中，19位作者按照主编们计算好的韵律齐头并进、步调一致。例如，乔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就基于美国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运动，对历史社会学的转型提供了一套竞争性的说明。瑞贝卡·埃米（Rebecca Emigh）在一份对各种描述和解释甚有价值的综述中重新审视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但她将第三波的独特性归结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背离、文化因素的重新引入、对渐进论的承认以及对多种路径的列举：埃米坚称转型与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以独立的第三方姿态，反对将民族的表征当作持久构成的群体的特征，并力主将民族视为一种偶发的、建构政治互动形式。《重塑现代性》之中这些个人贡献，削弱了人们对主编们大胆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一致性的印象，但却带来了更大的希望，即历史社会学家将继续充当历史与理论之间的重要枢纽。

事实上，布鲁贝克的文章本来很容易出现在这里讨论的第三本书之中：《牛

¹⁶ 不过，我必须为自己作为宗教问题分析者的资历做些辩护。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和出版的第一本书都分析了一场表面上是宗教性的叛乱，我写的有关法国和英国抗争演化的书反复涉及了宗教性的动员和冲突，我在最近几本书中对爱尔兰政治的分析不可避免地突出了宗教分化。参见，例如 Charles Tilly, “Civil Constit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Southern Anjou,”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 (1959), 172–199; *The Vendé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Trust and Rul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津处境政治分析手册》。罗伯特·古丁和我汇编此书，是对政治学内各种极化挑战的一项建设性答复。一极是像理性选择分析等路径主张的建立与无关时间、无关空间的政治行为一般性定律；另一极，后现代论主张既然所有的政治现实都建立在社会建构基础上，分析者们在追求他们偏好的政治结果时，除了解读这些现实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对于前一种主张，本书答曰：政治过程发生的处境影响着它们如何发生。对于后一种主张，本书答曰：“是的，社会建构起作用，但我们必须直面挑战，解释它实际上是如何运作并产生其影响的。”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称该书的整体研究路径为“系统建构论”。

这本《手册》整整 869 页，甚至让亚当斯 - 克莱门斯 - 奥洛夫的文集也相形见绌。在主编导言之后，它分为十编，每编分别介绍不同方面的处境。在其中九编中，都有一篇关于这种处境的长文，再加上三到四篇更短的、更具体化的文章。写标题文章的包括：

- 哲学为什么和如何起作用（菲利普·佩蒂特）
- 心理为什么和如何起作用（凯瑟琳·M. 麦格劳）
- 理念为什么和如何起作用（迪特里希·吕舍迈尔）
- 文化为什么和如何起作用（迈克尔·汤普森、马可·维尔维、理查德·埃利斯）
- 历史为什么和如何起作用（查尔斯·蒂利）
- 地点为什么和如何起作用（戈兰·瑟伯恩）
- 人口为什么和如何起作用（戴维·莱文）
- 技术为什么和如何起作用（维贝·E. 拜伊克）

本书以两位政治学范式之战的老将戴维·E. 阿普特和白鲁恂的反思文章作结。

这本《手册》共有 51 位作者及合作者，各表旨趣，嚶鸣相召，为系统建构论给出了充足理由。这是种双重观点：所有政治过程，作为处境的函项，在实际运作中千差万别，但处境的影响本身是可以作系统分析的。更准确地讲，这些文章展现了几个方面的处境效应（影响）：（a）分析者对政治过程的理解，（b）对

政治过程作经验考察的可用证据，以及（c）各种过程本身。因此，它投入了大量精力来理清 a、b 和 c 之间的交互作用——例如，可用证据与分析者的理解之间是如何彼此影响的。

以“文化起作用”这一编为例。在其引言中，迈克尔·汤普森、马可·弗尔韦伊（Marco Verweij）和理查德·J. 艾利斯（Richard J. Ellis）力主把“受约束的相对主义”作为一种思考文化与政治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澄清了政治学各种制度研究路径在多大程度上涉及这种受约束的相对主义，然后通过应用到当前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讨论展现了他们的论点。在“如何探查文化及其影响”一章中，帕梅拉·博林格（Pamela Ballinger）先评述了各种竞争性的文化人类学观念，然后仔细考察敏感的实地工作者们实际上是如何获知有关盛行于其研究的实地场景中的文化（即各种共享理解及其在象征与实践之中的各种表现）的知识的。

在“种族、民族、宗教”的标题下，柯特妮·荣格（Courtney Jung）与布鲁贝克同步，消极地认为“建构论设定的命题是，种族、民族和宗教（以及阶级、性别和性取向）没有任何决定其基本特征的本质核心。”¹⁷ 在积极意义上，她呼吁关注人们和群体变成由种族、民族、宗教、阶级、性别或性取向公开识别的主体和/或能动者的过程。苏珊·盖尔（Susan Gal）接下来讨论了“语言、其利害关系及其影响”。她的分析集中于人们如何逐步用某些语言而不是别的语言进行交流，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的行使。但她也反过来问到，给定语言的可用性如何塑造了政治关系。在最后一篇有关“政治文化的观念”的文章中，保罗·利希特曼（Paul Lichterman）和丹尼尔·塞法伊（Daniel Cefai）分析了政治文化如何“组织起行动者创造其策略、感知其行动场域、界定其身份和团结的方式方法”。¹⁸ 就此而言，他们对把政治文化作为共享表征、表现、日常交往和行动的各种相互替代的（但大部分也是互补的）分析进行了比较。因此，在《手册》中关于“文化起作用”的这一编中，分析者们在搭建一种对于文化是不断构建的、是具有政治后果的、也是可作系统分析的理解。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主编，古丁和我在招徕此编和其他各编的贡献者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但这本书整体上说明了我的观点：与伯克的实践感和亚当

¹⁷ Goodin and Tilly, 366.

¹⁸ Goodin and Tilly, 393.

斯 - 克莱门斯 - 奥洛夫的文化现象学相比，这本手册的作者们在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上趋同于另一种看法。我将这一看法命名为“系统建构论”，是想把大家的注意力从意识引向社会互动。它聚焦于关注人、群体和社会进程经由社会场所之中磋商交易的持续重构。它用对话类比一个不断改变其参与者并产生持续社会行动的过程。它提出了一种历史的映像——把历史当作一系列前后相继、意义重大的对话。

在历史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上，实践感、文化现象学、系统建构论相互矛盾，存在两重分歧。第一重分歧把伯克式看法作为自给自足的实践（可能需要后两者偶尔协助）与另两种更雄心勃勃的、将历史与理论熔于一炉的努力分开。但这两种综合式看法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文化现象学的提倡者们而言，受文化浸透的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中心，知识依赖于分析者穿透这种意识的能力，而阐释学方法提供了获取这种知识的手段。对系统建构论的追随者们来说，社会分析的中心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以及其他社会场所之间的各种交易，知识通过对这些交易的系统观察积累而成，从网络分析到民族志，各式各样的方法都对系统的知识作出了贡献。显然，我已经对第三条研究路径下了注。至少，对近期三本书的这篇比较书评应该表明了，赌注还挺高的。